

政治社会学的产生与发展动态

刘 在 平

在中国和西方思想史中，将政治放在广泛的社会背景中加以考察的学说和方法源远流长，并有着丰富的内容。但现代意义上的政治社会学的产生是现代社会中政治与社会各领域日益广泛和深入的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必然结果。社会学体系的建立及长足发展为之开拓了研究领域，并提供了理论借鉴和研究方法，而政治学自身的发展与变革——对人类生活及社会现实的强烈关注，直接促成了政治学与社会学的结合。作者认为，政治社会学在当代发展的基本态势和趋向表现在以下方面：

1. 从社会结构、社会矛盾出发研究政治权力；2. 从社会关系、社会背景出发研究政治主体；3. 从社会文化出发研究政治文化；4. 从对社会现代化过程的比较分析出发研究政治秩序与稳定；5. 从考察社会分层与结构的变化出发研究政治体制。

作者：刘在平，男，1951年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政治学教研室讲师。

一、政治社会学的意义

古老的政治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生了许多重要的变化与发展，其中突出的一点，就是社会学的兴起为其拓展了视野、开阔了思路。政治社会学在一定意义上是政治学与社会学相结合的产物，但政治社会学的产生与发展更深刻的原因显然不仅仅在于两门学科之间的结合与渗透。在人类的社会实践和社会生活中，政治现象本来就是社会现象之一。政治关系是社会经济、文化关系的集中表现。人类社会的各种活动——不仅是物质生产活动，也包括精神文化活动，甚至包括人类自身的繁衍活动——中的一切矛盾，都在政治关系中得以最集中、最突出的反映。同时，各个领域矛盾的复杂性、深刻性、变化性等均可在政治关系中得以把握和透视。政治的这种“反映”或“表现”功能，正是由其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宏观的整合、调节、控制功能所决定的。政治活动的相对独立性，丝毫也不能取代政治与人类社会的各种活动和各个领域的广泛而密切的联系。对社会领域的严格划分和对政治的抽象考察，作为研究的需要与方法的反映是可能的，但是，当我们探讨政治关系和政治形态、政治过程和政治功能、政治体制和政治结构时，则必须从广泛的社会领域中寻找它们的制约因素和决定因素。另一方面，由于政治系统在整个社会系统中的地位，无论政治统治、政治决策、政治功能，还是政治体制本身的变化，都会对整个社会发生重大影响。因此，政治与整个社会系统的相互作用是广泛的、深刻的，这是政治社会学必然产生并将深远发展的深刻原因。

实际上，如果从现代政治社会学的理论框架和研究内容出发来审视，应当属于政治社会学的学说在历史上实在是内容丰富、源远流长。在古典政治思想中地位突出的孔孟之道所推

崇的礼仪典章，既是尊崇祭祀祖先制度的产物，是以血缘父系家长制为基础的等级制和宗法、井田等经济与社会制度的集中表现，又渗透和影响于各种社会秩序和行为规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古训，编织出血缘宗法、道德伦理、统治方式的完整链条。墨翟“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天志、明鬼、节用、节葬、非导、非命”十大主张、老子“无为而治”等统治方策都伴随着对小农经济形态的描述与向往。可见，在中国古代先哲那里，政治思想与社会主张是统一的。这一点，比起西方中世纪神学政治、经院哲学以及18世纪的法理学理论来说，确有全面和高明之处。当然，在西方思想史中，政治学说与社会学说的互相渗透、并驾齐驱，亦是无可置疑的。萨拜因就认为：“柏拉图（Platon）的理论可分为两个主要部分或两个主要命题：第一，政治应当是一门依靠准确知识的艺术；第二，社会是由那些有能力彼此补充的人为了满足相互的需要而产生的。从逻辑上说，第二个命题是第一个命题的前提。”^①《理想国》虽因其包罗万象而很难说是某一学科的专著，但其政治学与社会学高度结合的特点则十分明显。这不光是它广泛论及政治、社会各种领域，而且对政治与社会的关系十分关注：从人的需要出发设计理想国家的轮廓；又广论理想国家中政治统治与政策在社会等级与分工、教育、家庭等方面的体现。亚里士多德（Aristote）虽然因其系统论述政治形式和权力结构而成为政治学的奠基者，但即使在其代表作《政治学》中，也洞察了决定不同城邦政治形式的社会因素。盛行一时的自然法趋向衰落，欧洲的政治哲学走向复兴和发展，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中世纪数学、形而上学、神学、经院哲学的狭窄和贫乏；而洛克（J.Locke）的学说则因其对社会层次的划分等实际内容而重新受到关注与欢迎。孟德斯鸠（C.Montesquieu）、伏尔泰（F.Voltaire）、爱尔维修（C.Helvetius）、卢梭（J.-J.Rousseau）等人的学说当然要丰富实际得多。孟德斯鸠提出了一套社会学说，并据此认为政体和法律的结构及其功能的发挥取决于一国人民生活的环境，既包括自然条件，如气候和土壤，又包括技艺与贸易的状况及产品的生产方式、智力与道德的气质和倾向、政治结构的行使以及民族性格中根深蒂固的习俗。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是从对于社会不平等、社会秩序、公民财产权利与自由的广泛分析中获取论据的。诚然，在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政治思想史中，政治学与社会学的结合尽管有广泛的基础和漫长的历史，但毕竟是偶然的，政治社会学作为一种理论概念体系和方法论体系高度结合的、自觉的、系统的学术体系，还远未建立起来，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事情。

现代政治社会学的建立与发展，有多方面的原因，至少以下三个方面是不容忽视的。

第一，在人类的社会实践中，在客观的社会现实中，政治领域与社会的各个领域之间的相互渗透更加深入和广泛，这可以说是政治生活的扩大，也可以说是政治更为社会化。政治结构与社会经济、文化结构分离的“二元结构”越来越成为天方夜谭。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互为因果、互为条件。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即使可以在目标选择上表现为某一个侧面的刻意追求，但其过程必须是全方位的动态演进。只要认真分析“亚洲四小龙”崛起的过程，就会看到那种认为它们采用了“政治集权、经济自由”的模式看法十分牵强。在许多国家里，公民和各种社会团体由更多渠道参与政治的程度空前提高，因而引起政治行为主体的扩大和多样化的趋势十分明显，这已引起政治学家的充分注意。在现代社会里，政治体制僵化和政治决策随意性受到严重挑战，这首先是因为社会经

^① [美] 乔治·霍兰·萨拜因：《政治学说史》，盛葵阳等译，商务印书馆出版，第68页。

济、文化、科技、教育的发展的迫切需要和密切制约。可以说，人口、能源、粮食、贸易、交通、卫生、环境、婚姻、消费等各方面的发展变化，都成为影响政治风云变幻的环境与气候；同时，国际社会的互赖性和一体化的增强，联合国各种专门机构的设立，各种就专门问题建立的国际组织、召开的国际会议、达成的公约与条约，都在表明任何国家的社会事物都与日俱增地具有外向性，都在成为国际政治和外交政策的必要内容。所有这些充分说明，忽略社会考察的政治学研究和脱离政治分析的社会学研究，都将肯定是贫弱的。因而，奥罗姆(A.M.Orum)认为：“政治领域及其行为者并非是脱离社会事物的孤立的因素，而视这个领域是与所有的社会机构(如家庭)以及经济有着密切的联系的，运用这种特别的方法来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就是众所周知的政治社会学。”^①

第二，18世纪末、19世纪初，人类社会发生了一系列急剧的变化，社会革命、社会冲突和社会结构的变迁，使社会理论家们的思维空前活跃。法国学者孔德(A.Comte)于1838年在其《实证哲学教程》中首倡“社会学”的提法，以后，迪尔凯姆(E.Durkheim)、韦伯(M.Weber)、齐美尔(G.Simmel)、斯宾塞(H.Spencer)等均以大量著述使社会学的体系不断丰富完善。当代，默顿(R.Merton)、帕森斯(T.Parsons)、霍曼斯(G.C.Homans)、布劳(P.M.Blau)、戈夫曼(E.Goffman)等人的理论以及功能主义、冲突理论、交换理论、符号互动论、现象学理论等方法论体系的产生，更推动了社会学体系长足直进的发展。社会学对于政治学的冲击，无论是理论概念的渗透、领域眼界的拓展，还是方法论的借鉴，无疑都是十分强烈的。

当代政治学在许多方面明显打下了社会学的印记。例如，社会学关于社会权力机制、权力合法化、权力与权威的区别、权威分类等问题的研究，极大地影响了政治学中的权力学说和国家学说。政治学家米尔斯(C.W.Mills)、达尔(R.Dahl)关于美国政治权力的分析，就直接、大量地采用了社会学的成果。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在当代社会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众多的社会学家，无论其怎样理解和对待马克思的学说，都无法否认其缜密的逻辑体系和深刻广泛的影响。而社会学关于社会分层和阶级冲突的研究，无疑将关于国家性质、政治统治以至于政党的研究推向深化。韦伯、帕森斯和后来的胡格韦尔特、英格尔斯(A.Inkeles)、艾森斯塔德(S.Eisenstadt)等人关于社会分化、现代化动力和过程等问题的探讨，深化了政治现代化和政治发展的研究。社会学关于社会分层、社会流动、社会冲突和社会平等等方面的研究，也从多方面影响和启迪了关于政治秩序、政治变革等课题的思考，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S.Huntington)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在这方面就表现得得心应手。他关于现代化过程中政治腐败的社会因素的考察、关于参与程度扩大和政治系统容纳程度之间矛盾的分析、关于社会结构分化、都市化、社会动员与政治秩序的关系的揭示等，都可谓融社会学研究方法于政治学的精彩之笔。总之，作为“后起之秀”，并有“后来居上”之势的社会学的产生、发展及其向政治学的渗透，是政治社会学应运而生的重要条件和刺激因素。

第三，二战以后，政治学领域出现了一项重大的变革，即行为主义方法论的兴起。一大批行为主义者的一项共同的重要主张，就是把人作为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于是，心理学、社会学的概念、理论、方法向政治学的大量移植，成为盛行一时的潮流。行为主义认为传统的政治学研究停留在历史的、法律的分析，而这种带有浓厚的哲学色彩和道德色彩的研究，没

^① [美] 安东尼·奥罗姆：《政治社会学》，张华青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有使政治学成为一门科学。摒弃意识形态,实现精确化与科学化,成为行为主义的刻意追求。同时,行为主义主张以定量分析取代定性分析,十分青睐数理分析、调查问卷、摹拟实验等方法手段,这无疑扩大了对社会学研究分析方法的需求。在以后的行为主义的“新的革命”中,虽然剔除了“纯科学”、“价值中立”等主张,但行为主义更加强调人的社会性,关注道德标准和价值取向,将社会经济问题、各种现实的社会问题和社会危机纳入视野。因此,政治学自身的变革与发展本身就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政治社会学的呼唤,而政治社会学始终是政治学和社会学相结合的宠儿。

政治社会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本身已说明了它在学术领域的地位和意义。

政治社会学着眼于政治系统与社会环境的关系,研究政治行为、政治过程、政治体制与社会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同时运用社会学的概念、理论、方法研究政治现象。社会环境影响和作用于政治系统的方式和途径、政治系统影响和作用于社会各个领域的方式和途径,这种双向作用在不同国家、不同社会的具体表现及其变化规律,都在政治社会学的研究中得以具体的揭示。但是,政治社会学的研究不同于社会学研究中把政治作为社会领域中一个领域的研究,严格说来,这种研究仍然属于社会学的范畴。政治社会学在其发展中已经初步形成了自己较为广泛的研究领域和丰富的内容,主要包括:政治权力的结构及其形成的社会基础;政治权力系统与社会阶级、冲突、等级与平等的关系;社会结构与政治形式、政治体制的关系;政治系统的社会文化因素;作为政治主体的个人的政治社会化过程;社会环境对各种政治行为的制约与影响;政党、政府、组织团体、政治精英等各种政治主体的社会背景;政治变革与政治发展的社会动力与条件;政治稳定、政治秩序、公民参与的社会基础等。

政治社会学的研究领域是动态的、发展的。它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论体系已初具规模,并且跨越宏观领域和微观领域。从其研究内容还可看出,政治社会学兼备理论学术意义和社会实践意义,在新兴学科和边缘学科并起的时代,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二、政治社会学的基本动态

在政治社会学触角所及的广泛领域中,有些研究方向或研究课题是许多学者所共同关注的,并且具有较为普遍、较为直接的社会实践意义,它们集中表现了政治社会学在当代发展的基本态势或趋向。对此,我们似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概括。

(一) 从社会结构、社会矛盾出发研究政治权力。

政治社会学对政治权力概念的分析有明显的突破,如达尔曾列出1400多种社会影响力,基此认为权力是“影响力的一种特殊形态,能给拒绝服从的人带来严重损失。”^①迪韦尔热(M. Duverger)则指出:“权力就是根据行使这种权力的社会的标准、信仰和价值得以确定的影响(或影响力)形式。”^②由于有了分析权力的社会因素的基础,无疑有利于引申出对于社会权力与政治权力、权力与权威的区别。同时,对于家庭、财产和所有制造成的社会不平等关系的分析,对于法律上的平等与事实上的平等的区别的分析,显然深化了对于权力影响力性质的理解。奥罗姆归纳马克思、韦伯、帕森斯等人的观点,将权力定义为作出对社

^① 转引自[法]莫里斯·迪韦尔热:《政治社会学——政治学要素》,杨祖功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08页。

^② 同上,第109页。

会有深远影响的强制性决定的社会能力，并认为对权力定义应从权力范围、权力来源、权力的扩张能力、权力分配等四个方面加以精确的表述。他从若干方面考察了影响美国政治权力的社会的影响因素：现代公司的扩张、国家机构及行政部门在社会中的扩张、劳动管理的强化与公民权利的扩大之间的矛盾，等等。

权力范围的大小决定了不同层次的权力主体，而同一层次的权力主体则可能因权力来源不同或对权力来源的发掘、掌握程度不同而具有不同的权力；权力的扩张能力影响到权力结构的变化，并引申出权力制约的问题；社会诸多因素影响到、甚至会打破权力分配关系的平衡，社会发展中对权力结构的调整问题就十分耐人寻味。

（二）从社会关系、社会背景出发研究政治主体

肯定政治主体的多样性是现代政治学十分有益的成果之一，这一点与政治社会学的分析很有关系。当政治社会学关注人的社会性时，把每个人都看作是在各种各样的互动体系中活动的。因而，对于人的社会关系以及人置身其中的社会集团的分析，成为研究政治主体的颇有启发意义的内容。乔治·居尔维奇曾对各种社会集团进行了详细的分类，提出了内容、规模、期限、组织基础、功能、协调程度、强制方式、统一程度等15项考察社会各种集团的标准。此后，社会集团的行为准则、价值体系、文化背景、阶级意识或意识形态、集团之间的互动作用等经常成为分析框架中的内容。这些探讨，为政治主体的产生、政治主体在社会系统中的地位、政治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影响其行为方式的社会因素等研究，提供了基础。

例如，当代西方政治社会学关于政党性质的分析，虽然距离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中关于政党起源与政党性质的论述相去甚远，仍尖锐指出西方政党内部权力正在落入寡头政治集团之手，而寡头集团的成员则醉心于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与特权。一些学者认为特定的社会和政治环境很可能促使现代政党的出现，并强调世俗化、自发性的社交及包括运输工具在内的通讯系统等三条原因，这里，忽视社会经济关系的作用，似有避实就虚之嫌，但他们关于“三种历史性的危机”促使现代政党出现的看法却颇为中的，即：合法化的危机、一体化的危机、参政的危机。不难看出，其中的含义是很有意义的：政党作为解决危机的手段，必须解决自身的危机，必须实现自身的合法化与组织结构、行为方式的现代化。

政治家研究是当代政治学中的一门热门。政治社会学从对于社区的分析入手研究政治精英，认为社区生活主要是由受以经济为权力资源的一小撮人控制的，而个人权力的有效性依赖于他所处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程度。亨特（F. Hunter）认为：“个人权力只有使它与一定的社交关系，小集团和体制形态联系起来才能显示出来。”^①他进一步指出了政治精英个人在决定社区生活上的局限性。达尔虽然提出不同于亨特精英模式的多元模式，但他更进一步强调政治精英人物基本权力资源的增殖和积累的过程。他的多元民主的理论建立在这样的基点上：认为现代社会存在着权力来源转换的机制障碍，例如银行中的存款不可能轻易地转换成市政府的权力。尽管不同领域的精英人物难以互相取代，但各自在决策过程中起着特殊的作用。因此，多元民主理论实际上是描绘了更为广阔的社会画卷。至于超越精英理论和多元理论的探讨，则关注到权力资源与各种社区资源、公共资源的关系，甚至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的方法，揭示权力兴衰是资本性质的变革、转化的结果。从以上可以看出，政治社会学十分重视研究权力载体的社会基础，寻找权力资源及其分配、转化的形式，

^① 转引自〔美〕安东尼·奥罗姆：《政治社会学》，张华青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99页。

从而查看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方式。这些显然拓展了政治学当中对于作为政治主体的个人——政治家或政治精英的研究的视野。

(三) 从社会文化出发研究政治文化

面对形形色色的关于文化的定义,政治社会学是在比较和筛选的基础上来规定政治文化的涵义的。比如,英国学者泰罗(E.B.Tylor)提出的关于文化的定义受到政治社会学的偏爱,他认为:“从广义的人种学涵义来讲,文化或文明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伦理、习俗,以及作为社会一员的人应有的其他能力和习惯。”^①有人对社会文化的结构划分了三种要素:行动方式、思维方式、感觉方式,进而认为社会角色和行为模式的体系构成文化。显然,当政治社会学倾向于政治文化是社会文化的政治方面,是社会文化的一种亚文化时,对上述观点是相当认同的。

政治社会学从社会文化出发研究政治文化,更重要的在于着眼于政治文化的社会文化基础,把政治文化放在整个社会价值体系中考察。比如阿尔蒙德和维巴对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墨西哥等五国进行了多年的调查和比较分析,写出《公民文化》一书,提出政治文化包括三个方面:认识方面,即对政治制度的认识;感情方面,建立在个人同领袖和机构的关系上;判断方面,包括对政治现象的价值判断。他们不仅从社会价值观出发来认识政治文化,而且指出政治价值和政治行为不会脱离社会其他领域中的价值和行为,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与整体社会文化相适应。即使这样,他们仍然被认为忽视了社会的阶级意识和亚文化群而受到其他学者的批评。

公民政治参与的问题,是政治学与社会学共同关注的一个热点。政治社会学在首先热心于公民政治参与的形式和范围的同时,注意到公民参与政治的行为受到其社会心理因素的支配,这里涉及到政治社会中各种个人主体在社会总体价值观影响下形成的“政治效应意识”,涉及到公民对政治制度和政治领导人的信赖感,以及由公民参与政治过程的不同程度所决定的对政治的关心程度等。显然,经济地位、社会分层、种族差异等社会因素使得社会公民从不同的角度接受和体现社会文化与价值观,许多学者就此发表了较为精辟的论述,明显地体现出置政治文化于社会文化背景中的特点。此外,关于政治社会化的研究更是注意到作为政治主体的个人在生活经历中接受社会整体文化感染的过程。

(四) 从对社会现代化过程的比较分析出发研究政治秩序与稳定

对于现代化模式的研究在社会学领域中已越来越占有突出地位,但西方学者一般表现出以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过程为参照系的倾向。对此,近年出现的关于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理论如“依附”理论、“迟发展”理论等,显然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纠正。比较分析的方法已开始步入现代化研究的领地,这又使政治秩序、政治稳定的研究更为广泛和深入。达尔的思路是,现代化的程度不同——政治体系不同——冲突与联合的模式不同——冲突与分裂的程度不同。亨廷顿则提出了颇具启发性的论点: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政治不稳定或政治无秩序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在现代化的变迁中,包括经济发展、都市化、工业化、教育提高、传播媒介扩大等在内的各种因素,提高了社会动员程度和政治参与程度,但政治制度化和组织化的程度偏低。因而,从协调政治制度、政治体制与社会动态发展所引起的各种变革之间的矛盾出发,寻求系统的统一,是避免政治秩序的紊乱、实现政治稳定的途径。

^① 转引自〔法〕莫里斯·迪福尔热:《政治社会学——政治学要素》,杨祖功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63页。

(五) 从考察社会分层与结构的变化出发研究政治体制

比较一致的意见认为,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决裂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社会结构的分化。传统的由于血缘和地域的原因而结成的社会结构越来越被由于利益关系、文化取向、功能作用等原因而不断分化的社会结构所取代。结构分化导致社会分层方面的诸多变化,如中等阶层的扩大、模糊阶层的产生、精英阶层的突出等。这些变化的社会效应,如艾森斯塔德在《官僚制与政治发展》中所提到的,是政治支持者有较大的流动性;参与政治动机中意识形态因素萎缩,转而注重“利益取向”;一定的统治者选择和争取政治资源的需求增强。正因为如此,依靠信仰的忠诚而支撑的体制——极权主义体制的生命力必然下降,而能够反映利益分化、多种需求、公民自由,亦即反映社会结构分化变革的体制——民主体制才是社会与时代的宠儿。在现代社会,组织发展的最一般特征始终是先赋和直接性的分配与调节不断减少,而各种非先赋且间接性的分配机制则不断发展。艾森斯塔德在作出这样的论断之后,进一步指出:现代化过程并非仅仅表现为主要制度领域中的持续性的结构分化。随着现代化的演进,当各种群体和阶层被引向较统一而共同的制度和社会中心,并且开始冲击中心制度及社会的象征领域时,它们的自给自足性和封闭性便土崩瓦解了。看来,这种分析不仅看到了社会结构变革所引起的政治体制在形式上的变化,而且透视到更为深刻的影响:传统社会的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与政治体制之间的内在联系的打破。这不能不表明,对政治体制的研究不应当是单纯的,当能够把握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在深层结构上的差异和对抗时,思维才是具有穿透力的。

主要参考文献:

- 〔法〕莫里斯·迪韦尔热:《政治社会学——政治学要素》,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 〔美〕安东尼·奥罗姆:《政治社会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 〔以〕艾森斯塔德:《现代化:抗拒与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汪玉凯主编:《现代政治学》,陕西人民出版社;
- 王沪宁:《比较政治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
- 〔美〕罗伯特·达尔:《现代政治分析》,上海译文出版社;
- 〔美〕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
- 〔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西德尼·维巴:《公民文化——五国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华夏出版社;
- 〔美〕D·P·约翰逊:《社会学理论》,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 〔美〕戴维·波普诺:《社会学》,辽宁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唐 军